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刺刀下的交易

本报评论员

苏修叛徒集团在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杜布切克一伙捷修头目押到莫斯科去举行了“会谈”，并在八月二十七日抛出了一个所谓“苏捷会谈公报”。这是美帝向苏修施加压力、美苏加紧全球反革命勾结的产物。这是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摆脱目前的困难处境，用刺刀逼迫同捷修叛徒集团进行的一笔肮脏的交易。这是捷修叛徒集团又一次无耻的大叛卖。这是苏修和捷修叛徒集团企图愚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一个十分拙劣的骗局。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苏修叛徒集团这一伙社会帝国主义者炮制的所谓“苏捷会谈公报”，就是一份典型的帝国主义官方文书。

苏修在这个“公报”中堆砌了许多漂亮的词句，什么尊重“领土完整”呀，什么“不干预内政”呀，什么“友好”、“团结”呀。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你们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还讲什么“领土完整”！

你们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头目弄到莫斯科去，用刺刀制造傀儡，这难道还不算是“干预内政”！

你们的坦克在布拉格横冲直闯，你们的侵略军队任意枪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友好”、“团结”吗！

“公报”大讲什么要维护“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这句鬼话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保住苏修叛徒集团在东欧的殖民利益。你们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是为了“大家庭”的利益；你们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是为了“大家庭”的利益；谁要是敢于违抗，你们就搬出坦克大炮，开进人家的国土，也是为了“大家庭”的利益。这同帝国主义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不是一模一样吗！

“公报”还说什么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苏修可以撤兵。请看美帝国主义在越南不也是口口声声地说，只要那里的“自由”、“和平”有了保障，美国侵略军“明天

就可以回家”吗？美帝和苏修这两个头号帝国主义者，在腔调上、无耻的程度上一模一样。

苏修叛徒集团在所谓“苏捷会谈公报”中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就是自己揭穿了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编造的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当时你们不是说，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是一伙“修正主义右派分子”吗？不是说，由于杜布切克这些人的“背叛行动”，“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造成实际威胁”吗？不是说，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履行“高于一切”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才不得不出兵吗？可是，没有过了几天，你们又在所谓“公报”中，来了一个陡然的大转弯，对以杜布切克为首的一伙领导人的立场表示“谅解和支持”，并且说杜布切克等人所执行的路线的出发点是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这真是一场自打嘴巴的精采表演！由此可见，原来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修正主义右派分子”的总头目，苏联修正主义就是葬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成果”的总根源，苏修叛徒集团是投降美帝国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急先锋。苏修叛徒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是彻头彻尾的大谎话。什么“保卫社会主义”之类，不过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而已。

所谓“苏捷会谈公报”，反映了苏修叛徒集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空前狼狈和孤立的处境。它本来以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布，并且稳住它在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霸主地位。谁知道，如意算盘落了空。苏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引起了苏联人民的反抗，遭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谴责。同时，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也因此闹得乱哄哄，连苏修的一些追随者也纷纷发出前所未有的怨言。苏修叛徒集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进退两难。撤也撤不得，呆又呆不下去。狗急跳墙无效，黔驴技穷，于是演出了这么一场刺刀下的大丑剧。

这次莫斯科会谈，是在美帝插手下进行的，是美苏加紧

全球性大勾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苏修和美帝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美帝国主义一方面默契苏修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方面又对它施加压力，要它以美苏关系的大局为重。美帝头子约翰逊、腊斯克，公开要苏修保持“理性”、“再思三思”，对杜布切克集团不采取“过分的措施”。苏修叛徒集团心领神会，因此急于设法稳住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都是在玩弄强权政治，把捷克斯洛伐克当作他们做政治买卖的筹码。他们这两家，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修叛徒集团，一开始就公开号召人民不抵抗苏修武装入侵，现在又在苏修的刺刀下屈服投降，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冷静”，要“慎重”，要“尽一切努力防止无谓的流血”，决不要同“现代化军队冲突”等等。一句话，要人民甘心情愿地做苏修法西斯占领军的奴隶。这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这一伙民族叛徒的卑鄙的奴才相。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而且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必然是民族的叛徒，这是放在人们眼前的铁的事实。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教育了全世界人民。它使苏联人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的人们，更加看清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本质，也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了摆脱苏修叛徒集团的占领和控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干涉，推翻捷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正在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开展。中国人民坚决站在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人民、苏联革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边。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彻底崩溃，一切妖魔鬼怪的彻底完蛋，不会太远了。

有改变。

苏修和捷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美苏合作的需要，在莫斯科炮制“苏捷会谈公报”，目的是欺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苏修占领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充分揭穿了“公报”上所谓“互相尊重”、“平等”、“友好”、“合作”等等，统统是骗人的鬼话。

苏修叛徒集团连日来源源把大量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据报道，入侵部队达数十万人。苏修占领军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城市后，随即向纵深推进，到处横冲直闯。苏修占领军恣意用枪炮杀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夜晚戒严时，见到行人就开枪射击。仅布拉格的居民就被打死打伤近四百人。同时，他们在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占领军端着刺刀任意闯入居民住宅，进行绑架和搜捕。所有通向布拉格的路口都设立了特别检查站，强行检查一切来往车辆和行人。占领军还剥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散发印刷品、传单和举行集会的一切权利。苏修占领军下令没收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石油，甚至拦劫公路上的车辆，把油箱中的汽油掏空。他们还强征粮食等各种供应品，抢走私人的收音机、照相机、手表等贵重物品。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下转第四版）

苏修坚持军事占领用刺刀迫使捷修叛徒集团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继续进行英勇的反抗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布拉格消息：苏修叛徒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默契下，悍然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一面采取法西斯手段，残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面用刺刀和大炮迫使捷修叛徒集团就范，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捷修叛徒集团向苏修屈服投降，无耻地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日益觉醒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英勇反抗苏修的军事占领，愤怒谴责捷修集团的叛卖行径。

苏修叛徒集团在二十日夜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实行法西斯镇压，并于二十三日把已经逮捕和拘留起来的捷修叛徒集团的头目挟持到莫斯科，双方背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肮脏的交易。经过四天的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在二十六日宣布“会谈”结束，捷修头目当天回到布拉格。

苏修喉舌塔斯社二十七日发表的所谓“苏捷会谈公报”，是苏修叛徒集团公然坚持法西斯军事占领和长期奴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供状；是捷修叛徒集团进一步屈服投降、全面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罪证；是美苏实行全球反革命大勾结、相互默契的结果。

苏修叛徒集团在公报中无耻地把这次武装侵略的法西斯行径，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了捷克

斯洛伐克领土”；并且宣称苏修占领军将要“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而撤出它的领土”，这实际上是坚持军事占领。公报还规定苏修将加强对捷修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活动的控制，说什么这是“有助于发展和加强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按：“社会主义大家庭”指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友好关系的有效措施”。捷修叛徒集团奴颜婢膝地表示效忠苏修叛徒集团，并且厚着脸皮在公报中写上：“为了避免发生有可能引起破坏安宁和社会秩序的事件和冲突，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已向向部队发出相应的命令”。这就是说，捷修将要协助占领军用武力镇压本国人民。在这些前提下，苏修允许杜布切克集团继续执政，声称支持这个集团在国内全面瓦解资本主义的做法。

苏修和捷修的暂时妥协，再一次暴露了美帝和苏修为了实现它们主宰世界的迷梦而互相勾结、互相合作的罪恶阴谋。苏修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就曾

向美帝头子约翰逊打过招呼。出兵之后，美帝一方面施加政治压力，要苏修撤军，并且公开为捷修的杜布切克集团撑腰，要苏修对这个集团“采取温和态度”；另一方面，却对苏修的军事占领，采取所谓“严格的”不插手政策”。美帝还特意告诫它在西德的走狗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闹出乱子，妨碍美苏勾结。美帝驻西德的大使，曾经向西德总理基辛格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这个意图；苏修驻西德的大使，接着也向基辛格保证，苏修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不会损害“苏德关系”。苏修这样做，实际上是通过西德反动政府向美帝献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修在所谓“苏捷会谈”中，允许得到美帝支持的杜布切克集团继续当权，又一次同美帝实行妥协。美国资产阶级报刊高兴地说：“杜布切克回来并继续担任领导一事，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人平静下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努力改善苏美关系”。二十八日，白宫发言人公开宣布，美国总统约翰逊同苏联进一步和解的希望没

革命职工大破中国赫鲁晓夫“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决依靠本厂的设备和技术,走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革命道路,试制成功八马力综合利用柴油机、适合山地耕作的小型拖拉机

(阳原县革委会报道组)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

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

河北省宝坻县革命委员会常委、窦家桥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侯 隽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听了情不自禁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一次证明，我下乡当农民的路走对了。

做“铁姑娘”，不做“棉花姑娘”

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宝坻县窦家桥落了户。

刚刚到农村，我的革命热情可高哩！可是，我光有改造农村的愿望，没有改造自己的思想准备。所以，一开始过农村生活，私心杂念就发了芽。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从小就过着吃粮进食堂，穿衣进商店的娇生惯养的生活。初到窦家桥，正是三伏天，和社员们一块锄地，不是把锄头弄得叮当响，就是插进土里拉不动。头上太阳晒，脚下热气烤，又热又累，腰痠腿疼。更还得上火烧火做饭、推碾捣磨、缝缝补补。我心里想：整天干这些有啥意思？听到群众的这一批评，眼泪围着眼圈转，满肚子委屈。那时我一心想要离开窦家桥，到农场去安家落户。

那些日子，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带着自己的活思想，我打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毛主席的书象明灯，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心，使我第一次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全国五亿农民谁个不劳动？广大农村妇女那个没有家务？为什么他们都能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我就委屈、动摇，想当逃兵？这说明我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贫下中农有很大距离。想到这些，我决心在改造世界观上下硬功夫，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积极主动接近贫下中农，虚心向他们学习，决心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

我下决定心磨炼自己，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怕苦，不怕累。拔麦子时，手磨了七、八个大血泡，泡破了，露出鲜红的嫩肉。再一抓麦子，手上的伤口象针扎一样疼。社员们爱护我，劝我休息。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又想想广大贫下中农社员成年累月这样干，我为啥干不了。于是，我咬咬牙又拔起来。社员们看我这样下劲干，都叫我“铁姑娘”。这自然是贫下中农对我的鼓励。可是，我想，我一定要警惕思想上象个“棉花姑娘”。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在困难面前还会软下来的。

有一次，突然下起大雨，我从地里跑回家避雨。可是，社员们为了集体，不怕风吹雨淋，在外面忙着抢土坯。这事，深深感动了我，我也就和大家一块干起来。任凭雨浇透了衣服，一个个都在紧张地战斗着，把土坯码齐，盖严了。我心中又高兴又惭愧。平日自己也口口声声热爱集体，可实际上却不象贫下中农那样关心集体。贫下中农热爱集体的崇高品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劳动时，社员们不管在泥里、水里、土里，都不怕脏，不怕累，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有一次，在修理房屋时，我和几个社员一起和泥，光着脚丫子，挽起裤腿，下到泥坑里，泥水、汗水弄得满头、满脸，也顾不得擦一把。可真觉得这时候的思想，却比什么时候都干净。我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劳动中，我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更深厚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坚定了。我常常和青年们一起帮助贫下中农挑水、做饭、看孩子、推米磨面。谁家房子坏了，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去修；谁家有了病人，我们跑得更勤了。有个五保社员病了，我们一天三趟帮他做饭，收拾屋子，给他请医买药，洗衣洗被。社员群众看了，都很感动。

迎着风雨，不怕尖锐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在这几年的群众斗争中，我和群众一起前进。

刚下乡时，我有一种错误想法，觉得自己阶级觉悟比农民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广大贫下中农不但在生产上一心为集体，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尖兵和闯将。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亲耳听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讲村史、叙家史，控诉阶级敌人的罪恶，亲眼看见他们大胆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地与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他们对阶级敌人最恨，对毛主席最爱，是我最好的老师。我和青年们组织起来编写村史、家史，访问了几户老贫农。一位八十多岁的贫老大娘讲完她的家史后对我们说：“别看那地主、富农表面上老实巴实的，心可毒呢！他们时刻想变天。”看！贫下中农阶级观点多么明确，阶级立场多么坚定！

事实教育了我。我逐步懂得了贫下中农是“革命

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道理。生动的阶级教育，使我加强了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在对敌斗争的大会上，我生平第一次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上，向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我揭发阶级敌人利用黄色读物毒害青年，施些小恩小惠拉拢干部阴谋。

为了与阶级敌人争夺农民，争夺青年，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我决心用革命文艺占领农村阵地。在广大知识青年的协助下，我们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到田间、地头，给广大贫下中农读报，辅导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群众十分爱看。后来，参加文艺活动的青年越来越多，我们又成立了歌咏队和文艺队。这样一来，每天上工前、开会前和社员休息时间，都有我们的革命文艺活动。

我们村盐碱地占全村集体耕地的百分之五十。“春季碱如霜，秋季水汪汪”。保种不保收，通常年景只收六、七十斤粮。怎么办呢？我想，同自然作斗争，是一场群众斗争，必须把群众的力量动员起来。于是，我和大家商量，建立了老农、干部、青年三结合的科学技术小组，下定决心根治盐碱。阶级敌人看到这些，恨得要死，大搞破坏活动。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跟着瞎说“刚吃两天饱饭，又不知干啥好了，碱地里种棒子，这是瞎点灯白费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根治盐碱的问题，而且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改变生产面貌，就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人们的思想。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以大寨为榜样，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苦战三年，在南洼荒碱地上第一次收获了亩产五百斤的玉米。社员们说：“时刻不忘毛主席”毛选，心明眼亮意志坚，贫下中农掌大印，负重千里不换届。”

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中国赫鲁晓夫在他那臭名昭著的黑《修养》中，极力散布“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反动谬论，妄想把我们拉向脱离工人、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火热的群众斗争，闭门“修养”的绝路，我们一万万个不答应。

铸就红心，一生永不褪色

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前进，阶级敌人却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把我挤走、压倒。

一九六四年，反革命分子周扬亲自跑到窦家桥大放其毒，叫我“写小说”，实现幼时所谓“当作家的理

想”，妄图用名利拉我下水。他问我：“写小说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你考虑过没有？”下乡成为文学家的理想怎么实现？”当时我感到很突然，就对他讲：“没有考虑过，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想当文学家了。”他见我沒有上套，就气呼呼地说：“把你们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还说：“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把你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想，过去学校的教育给我灌输了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搞个人奋斗，就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滑进修正主义的泥坑，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我一定要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我就坚决给他顶了回去。我说：“现在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理想，做一个新式农民，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就是我最唯一理想！”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卫兵横扫了“四旧”，横扫了牛鬼蛇神，并向走资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为了蒙混过关，利用续家谱、招家族，造谣诽谤，蒙蔽一部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大字报围攻我，说我是“心怀鬼胎”，假意到农村来的，是“周扬的彭真培养”的，还说我“幕后走资派”。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转移斗争大方向，曾多次煽动群众揪斗我。

有一次，我参加天津地区在我县召开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阶级敌人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县城里到处贴我的大字报，散发传单。我在大会上发言时，他们又煽动群众在会上捣乱，不让我发言。我心里真烦，不想讲了。可又想起毛主席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教导。今天，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我能妥协吗？决不能！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敌人。我高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我当场揭发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回顾我成长的历程，那一步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那一程不凝结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我仿佛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心里激动，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暗暗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一定给您争气，为了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捍卫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几年的农村战斗生活锻炼了我，我深深感到：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光明大道，这是我们要知识青年革命化，劳动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亲手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要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与工农结合的革命大道上坚定不移向前进！

苏修坚持军事占领用刺刀迫使捷修就范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继续进行英勇的反抗

（上接第一版）

苏修叛徒集团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以及捷修叛徒集团的屈膝投降和无耻叛变，深刻地教育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尽管捷修叛徒集团一再叫嚷要人民“不抵抗”和“保持镇静”，但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学生、士兵和居民纷纷起来，通过罢工、游行示威，有时采取武力反抗的形式，勇敢地反对苏修的军事占领。愤怒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苏修这次侵略，比作希特勒一九三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和现在美国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他们在占领军的坦克上涂上象征法西斯的卐字。人们愤怒地高呼：“俄国杀人凶手滚回去！”

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等许多城市的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入侵军队的枪炮和坦克面前毫无惧色，手挽着手地阻止苏修坦克前进。他们还炸毁和焚燒苏修占领军的坦克和军用车辆。有的青年学生跳上坦克同占领军进行搏斗而英勇牺牲。二十五日，一些布拉格居民拿起武器抵抗占领军的武力镇压。许多地方的居民自动组织了“抵抗突击队”。他们拆掉路牌，变换路标方向，有的还在公路上设置障碍。一些城市的路牌、路标在一夜之间就全部被拆除，给占领军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许多铁路工人阻止苏修叛徒集团运送军用物资，火车司机拒绝给苏修占领军开车，使苏修许多装满物资的车辆停在边界上不能开动。一些地方的居民拒绝向苏修占领军供应食品和饮水。

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重工业工厂和矿区，如捷卡德机械工厂、穆拉达波斯拉夫汽车工厂、维特科维泽钢铁厂、克拉德诺矿区和辛姆伯克矿区的工人，为了反抗苏修的军事占领，纷纷自发地举行罢工。布拉格的工人，二十三日中午举行了一小时的全市总罢工。

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伟大的列宁在痛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时候，曾经指出：这些叛徒是一伙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五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自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不仅在国内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同时对外狂热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加紧霸权主义，进行反革命战争，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它把一些国家当作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残酷掠夺和奴役；并且通过经济援助、军事修、援助，对一些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苏修叛徒集团挂的是“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是帝国主义主义的勾当。这次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它的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目最典型、最突出的大暴露。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二十八年前就曾指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且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六六页）《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早已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唾弃。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也必将遭到彻底破产。

名词解释

塔夫士矿工在罢工中提出了“不让一克核武器必不可少的铀矿落入苏联之手”的口号。俄罗斯拉伐的工厂和矿井工人，坚决反对苏修军队强占他们的工厂和矿井。

布拉格数千市民在瓦茨拉夫广场迎着占领军数十辆杀气腾腾的坦克举行了游行示威。一些示威群众，在布拉格市中心当着占领军的面焚毁了苏修叛徒集团的传单。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学生由于抵制入侵军队的接管，被打死打伤多人。但是，学生们不畏强暴，不妥协，抬着被苏修军队枪杀的同伴的尸首，高唱《国际歌》游行示威。

苏修和捷修在莫斯科达成的肮脏交易进一步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愤怒烈火，他们把苏修和捷修这次无耻勾当比作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协定。广大群众愤怒谴责捷修叛徒集团的美国罪行。他们说：“我们被出卖了！”二十七日，“苏捷会谈公报”刚一公布，布拉格数千市民聚集到瓦茨拉夫大街上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手挽手地向国民议会前进，高呼“我们不愿屈膝

求生”，“我们要了解全部真相”等口号。他们扯下了挂在建筑物墙上的捷修头目的画像，愤慨地说：“我们不愿再看到它！”“叛徒！”“叛徒！”在布拉格大街上，有人还乘汽车散发反对捷修集团的传单。二十八日在布拉格继续纷纷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群众愤怒地表示，宁可被枪毙也不接受“苏捷会谈公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在新的觉醒之中，他们逐步认识到修正主义是给他们带来这场灾难的根源。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决不会屈服于苏修的军事占领，也决不会听任苏修叛徒集团和本国修正主义集团的摆布。他们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革命斗争。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

工人阶级是科学技术革命的主力军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工人和驻所解放军痛斥中国赫鲁晓夫“专家治所”谬论的座谈会纪要

革委会委员、工人齐德福：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出发大肆叫嚷工人阶级“不能依靠”，“要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狂推行“专家治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贩卖“专家治所”的黑货，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垄断科学技术大权，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把它批倒批臭！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工人张锦卿：中国赫鲁晓夫一贯看不起工农群众，而把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捧上天。他在我们所的代理人胡说“工人手粗，文化浅，只能拿蚕茧子，不能搞实验。”搞科研至少得大学生。他们还象鹦鹉学舌一样学着黑主子的腔调，吹捧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就看看他们极力吹捧的两个很有“名气”的资产阶级专家吧！

这两个家伙一到我们所，就被捧上“权威”的宝座，外出车接车送，有人奉陪。上班时，夹着厚厚的书，钻进资料室翻本本。他们故弄玄虚，扬言搞一个柞蚕生理的研究计划，要到全国名牌大学查阅三年的资料。他们嘴上讲的“头头是道”，很有“学问”，其实什么学问也没有。就拿柞蚕育种、饲养来说，他们一窍不通。什么鸟吃蚕，他们也不知道，甚至说出了“燕子吃蚕”的笑话。这两个很有“名气”的专家，完全是 nonsense 的假专家。

革委会主任宋树林：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所的代理人，极力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场。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为主子“争气”。他们离不开洋本本，丢不开洋拐棍，从书本到书本，苦思冥想搞实验，搞来搞去，什么也搞不成。比如柞蚕室有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从生产实际出发，坐在实验室里要培育一种“理想”的柞蚕品种。他翻阅了许多资料，设计了一个“抗病育种”的课题。他独出心裁的设计，博得了所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喝彩，立即调拨了大量人力、物力，搞起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抗病育种”实验。整整搞了六年，一个理想的柞蚕品种也没培育出来，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抗病育种”课题的失败，充分说明了没有实践经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书读得很多，但办起事来最愚蠢。

中国赫鲁晓夫在我所的代理人，对广大工农群众却竭尽丑化、贬低、诬蔑之能事。他胡说：“工人手粗，只能拿镰刀、剪子、顶萝筐。”“农民的话只能信一半”。我们认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是最有学问、最懂科学的人。培育柞蚕新品种不能离开自然条件、生产实际和工农群众。辽宁省有几百年的养蚕史，蚕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应该走出门去，总结工农群众的经验，发现新的品种。我们的意见提出以后，走资派立即跳出来狠毒地攻击，“总结群众经验自扯！是个熊办法”。“辽宁省农民没有超过我们水的水平”。我们不听那！坚决遵照毛主席“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的教导，派出科学技术人员到全省主要蚕区，向蚕农学习。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现了四种优良的柞蚕品种。农家优良品种的发现，给了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记最响亮的耳光。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农群众最有资格

搞科学实验。

工人戚奎恩：我们所最近八年研究成功了十项蚕业生产技术措施，其中九项是我们工人搞出来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工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人有一颗不为名、不为利，一切为革命的红心。

就拿研究农药“灭蚕蝇”来说吧。我们蚕保室工人们在饲养中发现有许多柞蚕被一种寄生蝇寄生了，眼看就要绝种。我们心里很着急，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整天守在山上想办法。开始，我们搞了多次试验，都没成功。中国赫鲁晓夫在我们所里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站在一旁冷嘲热讽，百般刁难，还在人力物力上卡我们。有些好心人也劝我们：国内外都没有防治蚕蝇的好办法，你们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是搞出来，费了劲也得不到名，得不到钱。我们想：防蝇蛆是蚕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工人不图个人名利，要为革命挑重担。我们不能老是跟着别人爬行，国内外没有的，我们要有。我们要给工农群众争光，给毛主席争气。我们说服了好心人，继续实验起来。每遇到困难，就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青年人更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人名、权威吓倒。”毛主席的话，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大家不怕艰难险阻，狠下决心，不为蚕民解决问题誓不罢休。我们工人和青年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出了防治柞蚕寄生蝇的办法。

“灭蚕蝇”研究成功了。那些把持科学技术大权的专家“权威”们，都跑了出来捞油水，争名夺利。在走资派的纵容下，他们窃取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大写论文，乱发报告。为了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头，他们撕破了脸皮，争吵不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黑爪牙，把这些不学无术、只会争名夺利、投机取巧的家伙吹捧得神乎其神，就是要我们工农群众拜倒在反动学术“权威”的脚下，变成他们的活工具；就是让我们把科学技术研究大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为他们推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货大开绿灯。

“专家治所”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权

技术员王承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科学技术界的代理人却同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什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学技术是不行的”。还竭力鼓吹“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术师”。是靠工人、农民和有实践经验的革命群众搞科学研究，还是靠“厂长、工程师和技术师”搞科学研究？这就是毛主席革命的群众路线和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专家路线在科学技术界长期斗争的焦点。

我所走资派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采用种种卑鄙伎俩，积极推行“专家治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抗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国赫鲁晓夫胡说“应该破除界限，多有几个专家参加领导集团”。我所走资派首先建立了“蚕学会”和“所务会”。他们打着纯学术研究幌子，把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请进两个会，让他们领导所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垄断所里的党政财文大权。

“蚕学会”，只准专家、教授、技师、讲师参加。一般技术人员和工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学研究的主任被剥夺了参加科学研究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们有丰富的蚕业生产的实践经验，他们看不起。他们凭空设想订课题，硬要我们去执行。所谓“蚕学会”，根本不是蚕业科学研究会，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装非俱乐部，是在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会。

“所务会”，也只是主任室以上的技术干部参加。这些室主任也是有学问、有地位的“权威”们。这个所谓的“蚕学会”和“所务会”，确实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破除了“界限”。但是，他们破除的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界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真的让那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和资产阶级分子钻进来了。技术员王昌泰：中国赫鲁晓夫及我所走资派积极推行“专家治所”，就是包庇重用坏人，打击排挤工农干部。

中国赫鲁晓夫胡说：“搞自然科学的，对政治糊涂一些，破坏性少些。”党内一个最大走资派叫嚷：“对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用马列主义水平要求他们，现在我们要依靠他们，他们也能依靠。就是他们天天骂娘，能教课也是好的。”我所走资派也疯狂叫喊：“搞科研工作，政治上不要要求那么严。”什么“政治糊涂一些，破坏性少些”，什么“天天骂娘，能教课也是好的”，什么“政治上不要要求那么严”，拆穿一句话，就是让那些反动的专家教授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反党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文化大革命前，我所走资派竭尽全力，四处网罗反动的专家教授。一个国民党少将参议员、极右分子也被他请来了，吹捧为“柞蚕界第一流专家”。这个家伙好事不干，坏事干绝。一九六二年借养病为名，回无锡搞反攻倒算活动。在走资派的庇护下，他却逍遥法外。难道这个所谓的“政治糊涂人”，破坏性还小吗？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走资派视为“红人”，说他是“好同志”，“比我们党员强”。走资派为了给他捧场，“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多次派人去省、市领导机关奔走，甚至亲自出马。同时，还把这个家伙从普通技术员，一下提为六级技师。经常派他去外地作报告、进修、参加全国蚕业学术会议。我所的走资派就是网罗了这样一批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来治理所务的。

相反，他们对工农出身的技术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八年来，被打击排挤走的工农出身和部队转业的技术干部达十人之多。有一位党支部书记从部队转业到我所以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带领全所广大革命群众，揭露了十多个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走资派对他恨在心里，纠集要罗，给他扣上一顶又一顶的政治帽子，并给了留党察看一年和降级降职等处分，调离我所。所谓“专家治所”就是让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

齐德福：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为了让资产阶级专家、反动“权威”垄断科学技术大权，还极力框框定制度，阻止我们工人搞科学技术实验。我所走资派制定的“三严五定”制度就规定：重点课题必须由室主任和所长主持，从选择课题到细则，都由主持人说了算，别人不得随便参加意见。按照他们的规定，桑蚕室要研究“快速育种”的课题，最低要技师、副研究员一级的才能搞。我们那里没有，就得到全国各地去请。看到这些，我们工人非常气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越是拚命压制工人搞科学研究，我们越是要勇敢冲破层层阻力搞科学研究。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心情，一心想把自己几年来养蚕的经验总结出来，推广给广大蚕民，推动蚕业生产的发展。我自己文化水平低，就找了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员帮助总结。我们辛勤奋战了一两年，写出了几万的《养蚕技术》，受到了工人和蚕民们的欢迎。可是，那些“权威”们借口我们工人没有学位，不够级别，拿过初稿一看不管，扔在一旁不发表。他们就是用这些条条框框卡我们。你卡我的，我干我的。我们硬要为工人阶级争这口气。我又和工人张锦卿等四位同志总结了桑树剪枝的经验。他们看不起这个经验，又给打入了冷宫。以后由蚕具业局印成小册子推广出去。

革委会常委、工人尤锦锡：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依靠谁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政权问题，是科学技术大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为那个阶级服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中国赫鲁晓夫及我所代理人极力推行“专家治所”的路线，其目的就是搜罗资产阶级“专家”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要从无产阶级中夺去印把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权，复辟资本主义。

工人阶级当领导，科学实验展宏图

驻所解放军赵学贵：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我们蚕业科学研究所的革命工人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人员一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精神，打倒了阎王，解放了小鬼。我们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把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从宝座上赶了下来，把藏得很深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挖了出来，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科学技术路线，改革了洋教条和旧规章制度。工农群众真正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科学研究的命运。过去被走资派、资产阶级“专

家”“权威”们看不起的粗手、泥腿子，成了科学技术革命的主力军。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工人刚少彬，从前一直被他们看成是“觉悟低”，“不懂技术”，“不能依靠”的大老粗。在革命大批判中，他怒斥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所代理人对工农群众的丑化和诬蔑，狠批了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爬行哲学。他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忠诚的阶级感情，发扬了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另一个工人主动承担了“柞蚕一化育种”课题的设计和实验，而且搞得很好。这些事实，给了中国赫鲁晓夫当头一棒。

技术员李育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我所的现象。我们工农群众和革命科学技术人员登上了科学研究的舞台，掌握了研究所的大权。过去，我所资产阶级专家从镇江带来一种叫“三里丝”的柞蚕品种，在实验室关门来培育了七、八年，被吹嘘为“最佳品种”推广给蚕民。可是，在生产上不适用，群众不欢迎，称“三里丝”叫“三离死”，“最佳品种”成了“最假品种”。现在，我们在所革委会领导下，在所驻所解放军帮助下，通过革命大批判，砸碎了捆在手脚上的锁链。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同工农结合、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把多年关在室内培育的柞蚕柞蚕搬上了山。革委会派出科学技术人员深入蚕区调查研究，向贫下中农学习，总结蚕民的经验。还把盖县、凤城等地的养蚕劳动模范请到所里，和工人、科学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新课题。革委会放手发动群众办起了小药厂，直接为蚕业生产服务。工人和革命科学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敢想、敢干，成功地制成了专家“权威”不敢想，也想不出来的新农药——“灭蚕蝇三号”，为我国蚕业科学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点。我所蚕业科学研究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无数生动的事实，充分显示了工农兵群众的无穷的才智和创造力。事实完全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技术员陈允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的道路，实行科学实验、教学同生产相结合，经常深入蚕区，虚心向蚕民学习，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第一线搞科学实验。

一次，我们在蚕区调查中发现，要作茧的蚕百分之八十多被寄生蝇寄生。为了解决这个蚕业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我们打算试制一种灭蚕蝇特效新农药。方案提出以后，有些人觉得搞这些实验不如搞“尖端”价值大，劝我们还是翻翻辞典，重新设计课题。他们认为：搞蚕业科学研究，必须从蚕业生产实际出发，为蚕业生产服务，要说“尖端”，这就是“尖端”。离开生产搞“尖端”，是一文不值的“尖端”，工农群众不需要这样的“尖端”。我们看不能去搞这样的“尖端”。我们和这些人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相结合的教导，狠批了修正主义科学领导路线，肃清“专家治所”的流毒。在革委会领导和解放军支持下，广大革命群众帮助我们冲破了洋教条、洋框框的束缚。经过几十次反复试验，攻克了一道技术难关，终于在我国首次试制成功灭蚕蝇的高效新农药——“灭蚕蝇三号”。不久，我们又依靠集体智慧，群策群力，试制成功了另一种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农药。

我从实践中体会到：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人员，只有放下架子，甘当群众小学生，和工农群众一起干，才能搞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成果。

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范希雅：最近，毛主席又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指明了科学技术界斗批改的方向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吹响了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科学技术路线的战斗号角。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我们要坚决“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工农群众中选拔苗子，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培养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把科学技术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红彤、红峰整理)



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